

论学科化：中国民俗学的建设*

董晓萍

摘要：学科建设将历史传统和现代国家科学文化事业高度融合起来。学科建设也是搭建研究平台、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的优选方式，并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学科要素和创造未来学术价值。学科建设也不能缺少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能够带领团队为学科建设勇敢地担当和坚定地付出，推动学术发展，使学科建设更为持久。还有三点也很重要，即学科是否拥有自己的学术命题、经典著作和发挥团队的作用。

关键词：学科建设 民俗学 传统与现代 中外交流

学科建设是在中国与世界科学文化接触和关系变迁的前沿趋势中，在中国传统教育进入国家民族现代化进程阶段，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出现的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它通过划分学科和建立学科的途径，将中国传统书院式教育，改为现代学院式教育；将中国传统国学文史哲不分家的“先生”式的教育模式，改为由“行政”和“先生”双管齐下的教学科研模式。从中国实际讲，这样的学科建设不是仅凭一两位“大先生”的贡献就能做到跨越式发展，也不会是偶然成功的单一事件。自20世纪初或稍早，中国在原有政府和西方传教士办大学的基础上，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优秀学者（大部分是留学回国人员），以较小的知识分子群体，创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JJD7500003。本文是作者于2023年6月30日在欧洲孔院汉语教师培训暨第十六届国际会议“论学科化：研究与教学”上的讲稿，经压缩和修改后在本刊发表。

他们以深厚的中外知识学养，投身到不同学科建设之中，经过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条件允许下的艰苦奋斗，将中国高等教育建成中国现代科学文化领域的核心事业，他们本身也成为中国高校各学科的一代宗师。他们所在学科被赋予承担中华历史文明与现代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结合并为我所用的神圣职业，他们成为国家培养拔尖人才的教育使者，他们的形象也成为修身进己的人生楷模。高校的学科建设促成了知识系统的分科化、教学教材的专业化、学术资源的密集化和人才培养的制度化。这四化水平最高的就是国家重点大学。重点大学中的那些能够占据领军地位、处于教学科研前沿水平、具有国际交流能力、持续培养国家社会需要的高层人才的学科，就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被投入国家项目、研究基地、学科梯队人才、教学课程改革资源，获得优先发展。本文以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为例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校进行，已有105年的历史。两校原均隶属清末京师大学堂，拥有相同的源头。北京大学的民俗学以民间文学为主，在20世纪初兴起；北京师范大学确立了民俗学学科和在学科建设模式下发展民俗学，现也已走过74年的历程。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北师大民俗学学科在“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率领下开展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内高校民俗学教学科研的中心，是与国际同行和海外汉学家交流的重镇。1979年改革开放后，北师大民俗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思潮下，步入全面建设的黄金期，后来陆续成为第一批国家重点学科，211、985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单位，同时参与全国性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和新时期民俗志编写运动，在高端学术发展、研究生培养、社会应用和学术影响力方面，都对国内同行起到引领作用，是一个建设经验相对完整的传统学科，也是将中国传统优秀民俗文化高等教育与现代高校建设结合发展的特色学科。

现在是21世纪，新理念和新知识很多，中、欧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虽然参会学者中不乏欧洲汉学家和从事中国文化与汉语教学研

究的著名学者，但大都不是民俗学者，于是此文就要多次跨界。但跨界也有跨界的好处，就是高度概括，内外双视角提炼，并尝试将之提升到普遍意义的对话层面上。这对我是不小的挑战，但也让我充满兴趣。

本文不谈民俗学的分期史和学术史这个业内认为重要的问题，而是在大会题旨的方向上，讨论切入学科化问题的四个要素，即知识模式、学科转型、经典命题和基本要素。中国是一个历史传统极为深厚的古老文明国家，在这四要素中，中国知识模式是关键，其他三要素的内涵与变迁都受到它的左右。

一、国际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前史

在国际上，“民俗”的概念始于对英文“Folklore”的意译，出现在英国，由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于1846年创用，后来成为国际民俗学界通用的名词。当然民俗学的学术中心不在英国，而在芬兰。芬兰高校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百余年，一直是世界级的样板。至于“民俗学”的学科术语，国际学术界使用了另一个词“Folkloristics”，而将此前英国人提出的“Folklore”作为研究对象，以示区别。在中国，对“民俗”的提法超越几千年，还有“风”“俗”“礼俗”“风俗”“习俗”“风习”“民风”“谣俗”等多种近义词，并编印了丰富的书籍，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比较少见。中欧之间民俗现象的可比性有限，但论及学科建设，欧洲早，中国晚。关键在于学科的奠基者，他们的涌现，除了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学术渊源和个人资质等因素外，他们的国际联系对他们所在各国民俗学的学术形态也有制约作用，这在以故事类型研究为现象学基础和理论特征的民俗学界尤为明显。从这个学科在芬兰崛起伊始，就有以普遍分布的故事研究为标志的世界性特征。国际民俗学需要依据本土的民俗调查研究提出原创理论与方法，本土民俗学则要依靠国际化的过程获得

对自我民俗文化的清晰分辨和对差异化主体理论的深入认识。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本质而言，恪守本土民俗学与融入国际民俗学，是一种必然存在的跨文化规则，故很“土”的民俗学又被认为是国际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俗学也不例外。

（一）中国“民俗”的知识模式

民俗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漫长，但用早期文字记录早期民俗的历史就比较少见，民俗与生俱来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性格使其文字记录尤为困难，还有大量民俗是在不需要文字记录的情况下执行功能的，所以像中国这样从上古时期就开始记录民俗的国家少之又少。那时欧洲先哲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还都没有诞生，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吉尔伽美什》也只有少数泥版，印度两大史诗还要晚5个世纪左右，而在中国公元前10世纪至先秦的典籍中，就己能看到不断形成的民俗知识模式，它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综合体。

在甲骨文和《易经》中，记述了当时的气象历法、君王卜筮、军事征战、市井贸易、民居丧葬和工艺技术等。在《穆天子传》和《周礼》中，记述了上层礼俗仪式。在《诗经》中，记述了北方民歌与民俗；在《楚辞》中，记述了南方神话传说、民歌与民俗。在《尚书》的《汤誓》《盘庚》篇，《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与《庄子》《韩非子》中，记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祖先神话。在《左传》中，记述了“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国事信仰。在《吕氏春秋》中，记述了葛天氏操牛尾跳舞唱歌的农耕仪式。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对民俗观的谈论屡见不鲜。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主体意识形态，对民俗观也有支配作用。孔子把古代民俗改造成与礼治体制有关的学问，提倡“民教俗朴”^①，要求“志古之道，居今之俗”^②，还将冠、婚、丧、祭等人生仪礼都纳入谈论对象。孟子发

① 《孔子家语·王言解》，[明]何孟春补注，永明书院刻本。

② 《礼记·哀公问》，叶绍钧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

展了孔子的丧制思想，主张隆葬厚仪，但造成铺张浪费，受到主张节俭的墨子的批评。荀子转向伦理道德观，提出用美丑善恶的道德标准辨别民俗，用道德标准予以分类。上层统治者应该从俗为事，“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①，树立“民德”形象，扼制“国家失俗”的逆行。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对孔孟的上古理想国蓝图加以改造，也对荀子的美俗善政说进行发挥。他在《五蠹》篇中力倡“便国不法古”^②，推出变法易俗的新说。总体说，儒家学说中的民俗观对构建中国早期民俗知识系统具有奠基意义。

老庄的民俗观是自然民俗观。他们主张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的社会模式，让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③。在他们眼里，民俗的实质在于保存自然的人性。古代神话和初民习俗的魅力，在于它们产生于自然人性的本身，体现了人的感情、情绪、感觉和行为等生命的具体实在性，而与现实世俗功利的价值或某种为圣贤所承认的价值没有联系。庄子著书十万余言，不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多借神话寓言，指事类情，把民俗的知识与自然人的知识作为同一类型的知识进行处理。老庄的自然民俗观成为中国古代民俗论和文论中的“天籁”说的源头。

兵家的民俗观以和平为最高境界。《孙子兵法》的著名命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④，认为打仗的最大赢家是造成不打仗的结局，其本质是提倡人的“内省”。中国人容易接受一种通过提升自我、攻坚克难，获得对外部影响力的思想。中国人相信彼此扶助、万物相生的可能性。

汉唐以后，形成农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博物学、哲学和文艺戏曲的民俗文化记录。（1）在农学方面，历代农书《考工记》《齐民要

①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荀子选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1页。

② [战国]韩非：《韩非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③ [春秋]老聃著，冯达甫译注：《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4、175页。

④ [春秋]孙武：《孙子译注》，郭化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术》《岁时广记》《农书》《补农书》《农政全书》等对此进行了记载。中国也是农业行业数量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国家，在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科技、传统土木工程行业，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个案，流传着无数能工巧匠的故事。（2）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提出六书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其中至少有指事、假借与转注三书关联民俗，但语言文字学界讨论很少。指事，也称“兴”或明喻，在故事类型“皮匠馱马”中常用。假借，也称暗喻，在谜语和谚语中常用。转注，在民间行业语言的反切和佛教经典翻译中得到发展。（3）在史学方面，西汉司马迁《史记》是采俗补史、以史别俗之作。司马迁使历史成为一门与民俗相遇而不相合的学科。班固编撰《汉书》援例《史记》，另设《艺文志》等专章，保存了古代小说的目录。范曄《后汉书》最早收入盘瓠神话和九隆神话等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虽不是史书，但按照历史的方法整理汉代以前的神话和风俗名物史料，让历史与民俗著作触类旁通。（4）在博物学与哲学方面，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大批搜神博物著作，如郭璞的《山海经注》、干宝的《搜神记》、任昉的《述异记》、殷芸的《小说》。作者吸收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按照本土民俗的原来样式，对神话传说进行解释，体现了重新组织史料的主动性。宋代朱熹援佛入儒，刷新儒学，开了个好头。他的《诗集传》和《楚辞辨证》肯定中国南北民歌的民俗意义，这不简单，后来被顾颉刚和钟敬文多次引用。（5）在文学与戏曲学方面，汉唐以后汇编、文选和文评类著作增多，包括汉乐府民歌、南朝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宋代《乐府诗集》，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这些著作汇集了经史子集、宗教宝卷和戏曲歌谣等各类文献，官民僧俗概不排斥。此工作至明清未歇，所出现的名篇如明代冯梦龙的《山歌》《笑府》《广笑府》和《黄山谜》，清代的《天籁集》《广天籁集》《越谚》和《古谣谚》，晚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梁启超《台湾竹枝词》、俞樾改编的勾栏话本《龙图公案》。（6）宋代以后

出现都市民俗著作，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影响最大，这些书记录了勾栏瓦肆的百戏杂耍、说书讲经等文艺民俗，并自称“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①。元代关汉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名“注册”的戏曲家，他的《窦娥冤》和后来清代孔尚任创作的传奇《桃花扇》，都是吸纳民俗以补国政的名作。期间出现的高峰创作是唐宋诗词和四大古典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达到古代民俗文艺被天才作家改造化用的巅峰境界。

上述林林总总，不能直接构成学科化的概念。它们是中国式的民俗史资源，能说明中国古代民俗经过口口传播充满了含义。它们也让我们思考，为什么中国历代文人总是回到文本去观察风土民情，描写文本与社会关联的集体行为，还通过编书和写书，揭示内部社会运行携带民俗的整体意义。而中国传统国学、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育，一代又一代，承担了这样的整理和传播的工作。

（二）中国民俗资源的性质

中国民俗资源体量庞大，而由于有传统国学和传统书院的存在，从来就不是一盘散沙。但这两个传统单元的分类与教育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传统国学以经史子集分类完全是中国文化内部统一管理观的产物，民俗是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文化现象，无法统一而论。民俗现象需要经过更为普遍的类型观加以审视，才能评估其存在的价值，提炼其资源的性质，对此非民俗学莫属。民俗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检测本土民俗的性质。运用民俗学理论分析，中国民俗的性质是重复化与地方化并存、整体性与分层化并存。分析民俗的性质，是中国民俗研究与学科化的前奏。

1. 重复化与地方化并存

中国各个时代、各个门类和各个个体裁里都有“俗”“民俗”和“风

^①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序》，[清]丁丙、丁申辑：《武林掌故丛编》第一集。

俗”等重复的说法，从现代学科的概念看，这些说法之间缺乏一致性，需要重新做辩证的解释，需要对五花八门的概念加以统一。但中国民俗的性质告诉我们，在中国民俗知识模式中，一致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态的重复性。中国曾长期是封闭社会，不是说没有外交，没有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说中国长期保持内部运转，内部社会的重复就是迭代变更，内部文化的重复就是权威性的体现。重复给人们提供了熟悉的传统样式，那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传统节日和人生仪礼，正是通过重复来维系其生命力的。重复还创造了君臣相处和官民对话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在先秦典籍中，一位贤相服侍三代君主的故事经常出现，在不同典籍之间重复叙述的民俗例子也很多，像《晏子春秋》和《左传》的重复故事条目就达14条^①，儒家学说大量运用重复的方式，让故事叙事套路一再出现，帮助君主通过重复观摩和重复内省，学习礼俗管理，养成有德君王的品性，从事良政治理。此外就是重复记载的成书现象，也分布于农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博物学、哲学和文艺戏曲多学门著作中，这对中国传统国学和传统书院式教育维持文史哲不分家格局是一种助力。民俗是能够超时间存在的文化，也可以成为链接各学门的有机成分。历代文人往往以饱学杂家和驭民为得意谈资，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谈天说地信手拈来，展示个人才华。了解民俗知识模式的这种重复性特点，我们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重复民俗表述、文人学者的重复注疏与重复故事描述的写法，加以重新思考。

重复化与地方化的关系。此指历史名望人物在相同地点重复出现的现象，这里特别要说到南朝梁代的三本书，即萧统的《昭明文选》、刘勰的《文心雕龙》和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三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梁代重复出现，三位南朝梁的作(编)者都曾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

^① 汤化译注：《晏子春秋》，“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7页，详见“酒酣为礼”。另见第58—61，96—99页。又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19—1420页。另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5—138页。

又都有离开故乡本土回望本土的经历，再重新组织本土资料，便容易形成奇书。这种重复化与地方化的交集，还可以解释某地文风鼎盛、群星灿烂的原因。另一个例子是上面提到的南宋纪事体民俗志《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梦粱录》和《武林旧事》，四本书都记载杭州的风俗典礼，这种大范围重复与杭州是南宋首都有关。但简单重复也会破坏社会效益，无法长久传播，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于是文人对民俗进行改造。明清四大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都是拒绝简单的民俗重复，进行了天才的再创作，才成为千古名作。

还有一种突出的重复化与地方化结合现象来自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表现为慢节奏的生产生活而遵守农事信仰。与今天全球化下的快节奏和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相比，慢节奏未必不是好事。说到农事信仰，它自古以来就与农业活动、传统节日、民间科技和民间文艺相混合而重复出现，与西方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差别很大。

2. 整体化与分层化并存

由以上论述可见，中国传统国学不是不容纳民俗，相反，搜集和利用民俗是传统国学的组成部分。国学的局限是对民俗进行管理性的选择和淘汰。传统国学接受歌谣、谚语和故事，它们虽然是民间文学，但其思维方式仍在汉语表意系统之内，就是变化再大，其解释框架还是本土的。传统国学比较排斥神话，因为神话超越人类日常经验进行解释和传播，可以摆脱言语体系直接进入认识论，其解释框架不能在现实社会得到体现，无法定于一尊，所以不见容于传统国学。西方神话学有宗教学的基础，就发展得比较充分，因而中国民俗学的神话研究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

中国民俗主要不依靠汉字传承，而是依靠口头传承，但它仍然利用汉字思维。中国传统国学用汉字思维，中国民俗也用汉字思维，这样用汉字的思维与不用汉字的思维共同反映中国文化，这又在这个基本上造成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所以中国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不是完

全对立的，而是能互补的。如果进行国际交流，这种研究的难度极大，但却有很强的学科建设性。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过，汉字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社会模式创造出来，中国人在使用汉字和民俗两者中感到幸福，并造成社会稳定，详见沙畹的《中国民间艺术中对祝颂的表达》一文。^①

关于中国民俗资源的性质，还可以谈许多其他问题，限于时间，暂谈以上两点。

二、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转折点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只等一个时机。20世纪初，这个时机出现了。在当时，中西文化大碰撞和大交流，留学生出国留学后回国发展，撰写了有国学根基又不同于国学视角和国学解释的著述，为中国一批现代人文学科建设铺就了基石，包括民俗学。他们投入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还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回国前后在高校学习和工作。二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又接受了当时先进的外来学说，更加追求有问题的理论和有方法的资料。他们的留学经历，又让他们懂得如何处理理论的问题和使用处理资料的方法，并接受了严格训练。三是他们要掌握日、英、法、德、俄五门外语中的一门或两门，了解世界学术动态，并定期翻译一些著作，为国内提供专业术语参照系。四是要解决中国学问现代化的问题，建设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学科建设是有断裂的，但总是有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衔接点的。第一批学术带头人从国家社会文化改革看到现代性标志，从现代世界知识看到中外差异下的基本问题。他们从未与传统国学“割袍断义”，而是先模仿，后建立独立的问题与方法。

中国民俗学进入学科建设的转折阶段，产生了以下变化：

^① [法]沙畹：《中国民间艺术中对祝颂的表达》，《沙畹汉学论著选译》，邢克超、杨金平、乔雪梅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9—213，230—231页。

（一）创建专业化的学术期刊、建立内部专业话语和寻找对外交流的语言

1918年春，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1920年，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发行《歌谣》周刊，出版了97期。后并入《国学门周刊》，继续收集各类民间文学作品。1927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民间文艺》和《民俗》，以后民俗学专业杂志层出不穷。中国当代的学术期刊有：《西北民族研究》《民俗研究》《民间文化论坛》《民族文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等。民俗学学术期刊促进学科建设的关系有三：一是在民俗学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对学科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和次要问题，其中有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在学术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在学科团队建设上，锻炼了学术团队；三是确定了以本国为主，了解了世界同行的研究方向，扩大了民俗学者的学术视野，鼓舞了民俗学界对外加强学术交流的信心。

（二）从经史子集的国学分类转向民俗资料专集与撰写民俗学专书

此指将搜查编纂民俗专书的政治用途转为学术用途，将专题研究转为专业研究。胡朴安摆脱经史子集的国学分类，转向编辑民俗资料专集《中华全国风俗志》。^①五四时期，胡适发表了《歌谣的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一文，进行民间文学母题研究的尝试。^②北大歌谣研究会的顾颉刚，首次运用历史地理比较的方法，撰写了研究孟姜女传说的民俗学专书。^③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景深、容肇祖、常惠、胡适和黄石等也为民俗学写书和编辑资料，成绩突出。学术性翻译与研究同步的现象也很重要。1927年钟敬文与留法归来的杨成志翻译了《印欧故事类型》，此后于1929年和1930年，钟敬文分别完成了《楚辞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胡适：《歌谣的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原载《努力》周报1922年第31期，1922年12月3日出版。又刊于《歌谣》周刊第46期，1924年3月9日。收入何卓恩编《胡适文集·治学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146—152页。

③ 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中的神话和传说》和《〈山海经〉研究》两本书^①，他的民俗学研究工作也从这里正式开启，学术翻译让他找到了中国民俗学内外两种表达的出路。

三、中国民俗学学科的经典命题与基本要素

中国民俗学面临许多国际民俗学不能解决的本土问题，需要建立自己的经典问题。

（一）经典命题

学科化制度与经典命题是中国民俗学第一代学术带头人要同时解决的问题，这里先讨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它们都与确定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制度紧密相连，也都经历了国际交流和走自我发展道路的过程。

1.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

在芬兰、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民俗学都是一个学科，民间文学是民俗学学科的一个研究分支。在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则是两个学科。将民间文学独立出来，与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史有关。北京大学在五四时期已发起民间文学征集运动和相应的研究工作，1935年钟敬文赴日留学期间已发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②。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各地高校和进步社团掀起了抗战文艺与社会动员的高潮，这些都使民间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认同，教学储备得到了积累，学科建

① 钟敬文：《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钟敬文的《〈山海经〉研究》没有正式出版，但钟敬文已发表文章介绍了该著的内容，详见钟敬文《关于〈山海经研究〉——一封回答郑德坤先生的信》，原作于1930年9月21日，原载《民俗周刊》（杭州《民国日报》副刊）第五期，1930年。钟敬文：《〈山海经〉是一部分什么书——〈山海经研究〉的第三章》，原作于1930年6月2日，原载《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钟敬文：《中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原作于1931年11月6日，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1—211页。

②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1935年11月发表于东京，初刊于《艺风》1936年第4卷第1期，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设的条件逐渐成熟。1948年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钟敬文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建设民间文学学科，该学科的教学科研对象是民间文学基本理论、民间文学作品论和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方法论。

中国民俗的现代人文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但学科建设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才全面进行。中国民俗学的教学科研面向民俗知识的四大范畴：精神民俗、物质民俗、社会组织和语言民俗，同时承担建设中国民俗学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工作。

中国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分别建立了学科分级和学科编目。其中，中国民间文学下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编目。中国民俗学属于社会学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编目。

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虽然按两个学科进行建设，但两者又是关联密切的有机体。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还建立了两个研究分支：一是将两者的学术史与学术资料史共同建设，形成“民俗志与民俗志学”研究分支，二是将两者的研究史与搜集史共同建设，形成“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研究分支，两翼合围，促进两个学科的各自充分发展与交叉互补。这种学科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探索的结果，使中国民俗学成为内生焕新的传统学科和国际同行中的特色学科。

2. 口头与文献的理论关系

国际民俗学界一向偏重口头资料，长期只有口头研究一个中心。进入21世纪后，很多国家的民俗成为历史，于是国际民俗学界又提出口头与文献两个研究中心。^①中国自古以来兼备口头与文献，中国民俗学研究也兼顾口头与文献资料，这是中国民俗学的亮点。但在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上，如何将资料亮点转化为理论优势？钟敬文先生那一代前辈对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创造了经典个案，主要工作有二：

^① Lauri Honko, *Back to Basics*, in *Folklore Fellows Network 16*, Helsinki: Finland, 1998, p.1.

第一，在中国文化内部提升自然神话的地位。运用中国口头与文献的丰富资源，以植物神话、日月神话和动物故事为重点，提出中国人处理口头和文献两个中心的理论话语与方法论样本。中国以往重视经学神话，贬低自然神话，乃至以怪力乱神说加以排斥，通过民俗学的现代人文科学研究，帮助国人重新认识自然神话，也让国际同行和海外汉学界重新了解中国自然神话的特征，促进中外互鉴。在植物神话研究上，以钟敬文的《山海经》研究为例，他最早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甲骨卜辞、《易经》、《左传》、《周礼》和《史记》等文献与民间有关“巫”的口头传说，指出《山海经》与中医药植物学的关系，探讨民间医疗与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历史基础，认为：中国本土的“药”观念在先秦时期已经流行。这方面的学问，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按照独特形成过程所建立和精心加工的一套民俗化学说，其特点是：基于中国思维的独特性，形成史学、佛学和哲学的经典；基于神话传说，形成医书药典的写本；基于图像描述，体现人文理性；基于草本药物，贴近自然事物的认知体系；基于医疗仪式，进行天人沟通；基于身体规律，解释社会文化和结构的深层道理。^①这些解释都是原创的。

近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以李约瑟学说为基础，再提出，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学。他认为，中医药学说是关联性思维的产物。它不是研究身体的物理器官本身，而是关注身体器官的变化和功能，考虑现在的事情怎样变成将来的事情，个体的事情怎样变成家庭和社会的事情，人类的事情怎样变成宇宙的事情。关联性思维就是研究整体联系和系统性变化的思想方法，关联性思维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特性。^②由此点看，中国很多自然动植物传说、药物故事和图像绘本都不是普通的巫医巫药之说，而是一

① 季羨林：《中印民间文学的关系》，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化讲演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② 〔法〕汪德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第54—56页。

种思想体系，特别适合中国人用中国思维进行研究。如果看到中西医药学的差异，就能增加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关注，也可能启发西学。

在日月神话研究方面，钟敬文的《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是一篇经典之作。^①天体神话是民俗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中国古代已经出现关于日月调整神话的记叙，也有口头故事流传至今，如《后羿射日》。钟敬文将《易乾坤凿度》与马王堆帛画相对照，又使用了在云南民间口传的女媧伏羲新资料，指出，中国早在西汉末期已有对日月调整神话的记载，在《易乾坤凿度》中的说法是“阴阳交争”^②，庄子《应帝王篇》记为儻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这是更早的天地开辟的故事，为老庄思想所发挥。在中国古代神话资料中，“始”指盘古，盘古生宇宙为初始，然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民俗学中，将之视为宇宙变成说，与儻忽、混沌、盘古都是同型神话，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语境中都流传过。以往的哲学解释和历史学解释都是单一的，加入民俗学的解释就能吸纳多元，包括对黄老学派所谓天、地、人为一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做出更为贴近当时社会历史的理解。^③钟敬文还使用了其他历史典籍，如战国屈原的《天问》、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东晋郭璞的《玄中记》等，证明口头与文献皆非孤证。当然口头用语、文献用语与现代民俗学用语不同，但多角度发掘本国历史资源，补入民俗学的解释，将有助于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

3. 多民族之间文化不平衡的问题

多民族之间文化不平衡问题是中国民俗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点，1950年代初学苏联，中国民俗学者很希望通过“老大哥”理论获得直接经验。当时苏联理论对中国高校民俗学学科的影响主要有7点：

① 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原文撰于1973年，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21—147页。

② 同上书，第128页。

③ 详见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4、189页。本句内容是作者根据原著观点的概述。

(1) 政党、人民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2) 统一进化论，(3) 历史与现实统一性，(4) 学术史与学科建设史，(5) 民间文学的文学性与不足，(6) 民间文学的艺术化问题，(7) 女性问题。

但是，事实上这7点是不能照搬的。钟敬文先生等借鉴了苏联理论，但又根据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将7个问题变成4个问题：

(1) 学习苏联理论，“应该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彼此的学术，固然可以、乃至必须互相借鉴，互相吸取营养，但也应该坚持民族的自主的态度，不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①。要深入本国民俗学研究对象之中，对外国理论“在开始研究时，它是一种引导；再往后，它是一种借鉴、参考和强化分析、论证力量的助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始终不深入到所研究的学术对象之中去……就不但不能自己得出有创造性的理论；甚至对别人的理论，也缺乏一般评估和判断的真正能力”^②。

(2) 从文学切入。单一建设民间文学学科，“自然有积极的一面，如它使我在广泛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上，开辟了自己较专门的一部分园地……但是，不可否认的，它也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限制了我对民俗事象的其他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社会组织方面等）的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限制（或说畸形），使我作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分明是有它的缺点的”^③。

(3) 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它们到底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产物。两者基本上是可以分开、也是应该分开的”^④。苏联理论强调统一进化论，抹杀了各民族民俗民间文学自身的特点，也会让理论走上歧途。

①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0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苏联理论部分对钟敬文著述的引用，经过我个人的理解和概括，但对所依据钟敬文的基本观点出处一律都做了注释。

② 同上书，第52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④ 同上书，第49页。

(4) 必备的知识结构。钟敬文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民俗学在中国学界还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一些研究者,缺乏完备的、必需的相应知识,只凭借一些普通常识或文学理论知识就去进行考察,并加以评论,因此,往往不免说‘外行话’了”^①。事实上“小学生不可能具备大学生的知识”^②,中国民俗学要通过勤奋努力,从幼稚走向成熟,才能达到自己的理论目标。

解决中国多民族文化不平衡的问题涉及历史,也涉及现实,还涉及文化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民俗学者终于懂得,其实苏联也没有法宝。民俗学这种学科可以国际化借鉴与交流,但一切还要靠本土。

前人还有其他历史上外来影响的问题要解决,如印度佛经故事对中国民俗叙事传统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印故事再研究——钟敬文与季羨林合作的一段学术史》中做了比较仔细的讨论^③,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解决经典问题的作用是,有助于进行学科定位与特色化建设。

(二) 基本要素

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是学科制度化的结构成分,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包括科学研究(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经典命题、代表作),课程设置(专业教材、专业课程体系、课程系统、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系统(培养模式、学位制度、学科梯队、研究基地、学术杂志、专业图书)和社会就业(毕业人数、答辩与获学位人数、社会贡献程度)等。这在其他学科也有,这里主要就民俗学学科有特色的部分,简要说两点: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

① 钟敬文:《我与中国民俗学》,张世林编:《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53—54页。

③ 董晓萍:《中印故事再研究——钟敬文与季羨林合作的一段学术史》,《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1. 课程设置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的课程设置贯彻“民间诸科学”的理念。钟敬文主编中国高校民俗学两部经典教材，即《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①，将民俗学知识系统与理论结构划分为六方面，即民俗学原理、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和民俗资料学。他对这六方面的命名，是他从民俗学学科的角度，所创用的一批教学科研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有的后来被他用作博士生专业课的名称，如“中国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他还亲自担任了主讲，这门课现在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科博、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有的概念在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科中青年教师开设的专业课中用为课名，如“民俗学原理”“民俗志”和“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概念还成为国内同行使用频率极高的专业术语，乃至在相邻学科和交叉学者中也广为使用。民俗学的课程系统，围绕理论结构设立，近年发展了跨文化民俗学方向，进一步巩固了民俗学对内开展中国多民族跨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提升了民俗学的国际化学科特色，同时对民间文学研究的中国化与国际化特色加以更新和发展，开设了跨文化民俗学、跨文化民间文学、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等系列课程，侧重中日、中印、中俄故事个案研究，也开展中西故事跨文化研究，培养懂中国、观天下、跨文化的新型民俗学学科研究人才。

2. 人才培养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四种模式，即中央高校研究生教育、地方教育、多民族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在学位制度上，民俗学学科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民俗学学科的教师梯队、研究基地、国际交流、学术杂志、专业图书等与之相适应，积极与国际一流同行交流，合理吸收外来先进经验，建设民俗学高层专业

^①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初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钟敬文主编，许钰、董晓萍副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教育的国家级规范标准，强调民俗学高等教育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对前辈长期从事民俗学高校教育的历史经验加以发扬光大，继往开来。此外还有不可或缺团队精神。

结 论

本文讨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百余年的历程，侧重关注第一代学术宗师。一般学术界或他们本人谈及其治学之道，都会讲20世纪初中西交汇的作用，其实从这百余年的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史看，还有另一个强大因素塑造了前人的学问人生，即中国传统书院式教育与中国现代学院式教育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双峰并立和共存互动的的作用，这使他们既博大精深，又术业精专。他们还都有留学经历，可以从中国和世界两个角度思考问题，转化传统，反哺现代，直至为某一门或某几门学科树立了坚实的中国式现代人文学科的里程碑。20世纪中后期以来，流行现代学院式教育，疏远传统书院式教育，所培养的学者都是学科学者，很少文化通才，这就使教育有赢有输，输的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陌生，乃至发生学科与传统的断裂。^①我们总结现代学科建设史，就要了解这种情况。

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除了学术大师，还需要群星璀璨，还需要团队工作，本文只是举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相关的研究还将陆续展开。

不管怎样，今天讨论民俗学单一学科的学科建设，在全球连通的世界环境中展开，在学术视野上，除了民俗学圈内自身已有的国际化传统，还要加强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注意开展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中国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尤其不能脱离中国国学的出身和中国书院式教育的历史传统，力争做到立于双峰，行之长远，珍惜传统，创新向前。

^① 关于学科知识断裂的讨论，参见〔法〕白乐桑（Joël Bellassen）《法国汉学渊源及其文化背景》，本刊第47辑（2022年），第17页。

CSSCI
来源集刊

CSSCI 来源集刊

Dialogue Transcultural

跨文化对话

第 49 辑 | 主编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主编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跨文化对话

Dialogue
Transcultural

49

198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对话·第49辑/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ISBN 978-7-100-23163-3

I. ①跨… II. ①乐… ②李… III. ①东西文化—比较文化—文集 IV. ①G40-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9405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跨文化对话

第49辑

主 编 乐黛云 [法]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董晓萍

副 主 编 [法]金丝燕 陈越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3163-3

2023年1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2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½

定价: 126.00 元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特 稿

Special column

- ChatGPT 热潮下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钟秉林 3
Zhong Binglin, Educational and Learn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mid the ChatGPT Boom
- 法国中世纪史诗研究 [法] 米歇尔·冉刻 (崔欢 译) 9
Michel Zink, translated by Cui Huan, On the Epic of Medieval in France
- 洞察时代 传承学术 理解人生
——“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致辞 陈越光 35
Chen Yueguang, Sensibilisation contemporaine, transmission scientifique et comprehension existentielle
- 饶宗颐国学研究方法论 邵友伟 郑炜明 38
Shao Youwei & Cheng Wai Ming Peter, On Jao Tsung-i's Method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专 稿

Focus

- 文化转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和认识论的贡献
.....[法] 米歇尔·西班牙 (董晓萍 译) 55
Michel Espagne, translated by Dong Xiaoping, Cultural Transfers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and Epistemology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 朝向美感文心的学科未来
——中国文艺批评学科介绍王一川 74
Wang Yichuan, Towards the Nature of Aesthetic and the Literary Study and its Trend in
Future: an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Critique in China
- 论学科化：中国民俗学的建设董晓萍 80
Dong Xiaoping,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Folklorstics
- 两赴天竺：徐仁在印度的留学及其科学研究陈 明 99
Chen Ming, Two Trips to India: Xu Ren Studying in India and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论 稿

Articles

- 圣本翻译与公元五世纪中古汉语的形成
——《长阿含·转轮圣王经》巴汉对勘研究[法] 金丝燕 149
Jin Siyan, Traduction du texte sacré et naissance du chinois médiéval au V^e siècle-Cas
du Cakkavatti sutta
- 文化转场：《恶之花》的韵律汉译王以培 157
Wang Yipei, Cultural Transfers: Keeping the Chinese Rhythm in Translation of Les Fleurs
Du Mal by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在翻译学视域下的“金蛇王权”：在真实与虚构中 重构晚明	高 博	169
Gao Bo, Golden Snake King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logy: Reshap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Reality and Fiction		
兴：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朱利安论中国诗的“曲则通”	吴泓缈	193
Wu Hongmiao, Xing, Ways of Attaching to the World: the Detour and Access in the Chinese Poetry Interpreted by Francois Jullien		
中国笔墨与中国园林的精神性	潘公凯	207
Pan Gongkai, Le jardin en encre chinoise		
“禅会图”意涵源流考证 ——中日文化互动中的禅宗绘画概念演变	王圆中	212
Wang Yuanzhong,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an Hui Tu”: the Concept Transfer of Chan Paintings in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中国的政治性镜隐喻及对古代日本的影响	刘琳琳	237
Liu Linlin, Chinese Political Metaphor as Mirror and its Influence on Ancient Japan		
文明互鉴视阈下中俄图书出版的回溯与启示 ——基于二战期间两国主题图书出版的实证研究	刘 淼	254
Liu Miao, Retrospe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Sino-Russian Book Publish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matic Books in Both Countries During World War II		
试论田间诗歌创作与外国诗歌的关系	熊 辉	268
Xiong Hu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m by Chinese Poet Tian Jian and Foreign Poetry		
回到马克思：重估亚当·沙夫的符号学思想	陈文斌	286
Chen Wenbin, Back to Marxism: Rethinking Adam Shaff's Semiotic Idea		
非洲文学研究的新建设 ——评《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	杜志卿	305
Du Zhiqing, Approaching New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Focusing Sub-Saharan African Literature		

学术信息

Bulletin d'information scientifique

文化转场：翻译与观念的迁徙

——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国际研讨会综述……………周小珊 313

Zhou Xiaoshan, Transferts culturels et transmission des idées colloque international, 8^e Festival Arts Chine

东西方再相遇：北京大学—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孔子学院

人文论坛……………杨嘉明 326

Yang Jiaming, On East and West Re-encountering: Humanities Forum Held by Peking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Artois

写本·图像·药物

——欧亚医学知识相遇与文明互鉴学术工作坊综述……………汪 炆 329

Wang Yang, Text, Image, Medica Science: Encounting of Medical Knowledge from Asia and Europe and the Learning of Mutual Civilizations

跨文化研究生公益教育……………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 333

College of Transcultural Studies at BNU, Public Welfare Education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作译者简介……………342